

抗战时期中国民间力量的团结与互助机制探析

谢亦忱

武汉理工大学, 湖北 武汉 430070

摘要： 本文探讨了抗战时期中国民间力量的团结与互助机制，重点分析了宗族与邻里互助网络、民间组织与行业团体的自发联合以及资源共享与集体生产模式等方面的作用。通过研究，发现民间力量在资源调配、物资保障、社会动员和救济等方面发挥了关键作用，尤其在战时社会秩序和民众生计的维持中起到了不可替代的作用。民间的团结互助机制不仅有效提升了社区内部的凝聚力，还增强了社会救助能力，确保了民众在战时艰难环境中的基本生存。本文为理解民间力量在历史重大时期的作用和当前社会治理提供了宝贵的历史经验与启示。

关键词： 抗战时期；民间力量；团结互助；资源共享

An Analysis of the Unity and Mutual Assistance Mechanism of Chinese Folk Forces During the Anti-Japanese War

Xie Yichen

Wuhan University of Technology, Wuhan, Hubei 430070

Abstract： This paper discusses the solidarity and mutual assistance mechanism of Chinese civil forces during the Anti-Japanese War, focusing on the role of clan and neighborhood mutual assistance network, spontaneous alliance of civil organizations and trade groups, resource sharing and collective production mode. Through the research, it is found that the civil force plays a key role in resource allocation, material support, social mobilization and relief, especially in the maintenance of social order and people's livelihood during wartime. The civil solidarity mechanism not only effectively enhanced the cohesion within the community, but also enhanced the social assistance capacity and ensured the basic survival of the people in the difficult wartime environment. This paper provides valuable historical experience and enlightenment for understanding the role of the folk forces in the important historical period and the current social governance.

Keywords： Anti-Japanese War period; folk power; solidarity and mutual assistance; resource sharing

引言

抗战时期，中国社会面临着前所未有的挑战，战火和社会动荡使得民众的基本生计和社会秩序受到严重威胁^[1]。在这一背景下，民间力量通过自发组织和合作，形成了一系列团结互助机制，有效缓解了社会矛盾、保障了民众的基本生活需求^[2]。传统的宗族与邻里网络、各类民间组织和行业团体的自发联合，成为支撑民众生存的重要力量^[3]。资源共享、集体生产、互助合作等模式，不仅帮助贫困家庭和灾民渡过难关，也增强了社区内部的凝聚力和社会救助能力^[4]。这些民间力量的运作模式对社会的稳定起到了关键作用，也为抗战胜利提供了坚强的社会后盾。本文旨在探讨抗战时期民间力量的团结互助机制及其在社会生存中的作用与影响。

一、抗战时期中国民间力量的基本概况

（一）民间力量的主要构成及特征

抗战时期，中国民间力量主要由乡村社区、地方社会精英、商会、工会、慈善团体、宗族组织以及普通民众等多元主体构成。这些民间力量广泛分布在城市与乡村各个层面，具有较强的地方性、社会性和自治性特征。在乡村地区，民间力量主要以宗

族组织、村落共同体和乡约制度为依托，通过乡里邻里之间的互助协作，维持社会基本秩序，推动社会资源的共享与互济。在城市地区，商会、工会和慈善团体等民间组织广泛存在，这些组织具备一定的动员能力和社会影响力，能够在紧急情况下迅速组织社会资源，为社会稳定和民众生活提供支持。这些民间力量在抗战时期展现出了高度的团结性和自发性，形成了社会自治与互助合作的基本特征。^[5]

在抗战时期，由于外部环境的急剧变化，政府力量的辐射范围和作用能力受到一定限制，民间力量便成为社会稳定和资源调配的重要支撑。在此过程中，地方社会精英作为桥梁，通过动员乡村资源、调解民众矛盾、组织社会互助等方式，促使民众迅速建立起自救与互救的机制。同时，商会、工会等民间组织也发挥了资源统筹、物资筹集、信息互通的重要作用，为民众的基本生计提供了持续保障。总体而言，抗战时期的民间力量以其强大的社会粘合力和自我调节能力，形成了高度自治、互助合作的社会网络，在社会动荡背景下展现出重要的社会支撑功能。^[6]

（二）民间力量在抗战时期的社会功能

在社会动员方面，民间力量依托乡村宗族、地方社区和行业团体的广泛网络，通过口耳相传、标语宣传、集会演讲等形式，广泛传递信息，凝聚社会共识。在城乡基层，地方精英、商会、工会以及慈善组织通过号召和协调，积极鼓励民众参与生产、捐赠物资、提供人力支援等活动，形成了强大的社会动员力量。同时，地方社会力量还通过建立乡村防护组织、互助团体等形式，自发进行社区防护、物资储备和社会救助工作，在确保区域社会稳定的同时，也为抗战期间的民生安全提供了有力保障。^[7]

在物资保障方面，商会和行业协会依托自身的网络与资源，通过联合募捐、物资集中采购、提供后勤保障等形式，确保了民众的基本生计。在医疗救援方面，地方慈善机构和医疗组织通过开设流动医疗点、成立救护站、免费发放药品等措施，及时救治伤病人员，防止疫病扩散。在灾民安置方面，地方社区、宗族组织和互助团体依托村落网络和家庭纽带，广泛开展邻里互助、流民安置、公共食宿保障等工作，最大限度地维护了社会秩序的稳定。这些功能的发挥，使民间力量成为抗战时期维护社会稳定、保障民众生活的重要支撑力量。^[8]

二、抗战时期民间力量团结机制的形成

（一）基于乡土社会的宗族与邻里互助网络

在传统农村社会中，宗族组织以血缘关系为纽带，将同姓族人联系在一起，形成了具有强大凝聚力的社会结构。在抗战环境下，宗族组织发挥了显著的动员和互助功能，当外部环境恶化、社会秩序遭受冲击时，宗族长辈或地方族长便承担起组织协调的职责，迅速动员族人互相帮助、共渡难关。例如，在遭遇兵灾、物资短缺或生产受阻时，宗族会集中调配粮食、安置流民、互助修缮房屋等，以确保族群内部的基本生计不被中断。这种以血缘为纽带的互助网络，不仅有效稳定了乡村社会秩序，还在一定程度上弥补了基层治理力量的缺位，为抗战时期的社会稳定提供了重要支撑。^[9]

在日常生活中，邻里之间基于地缘关系形成了互帮互助的传统习惯，而在战时环境中，这种地缘网络被进一步强化。在遭遇战乱、生产困难或人员流离失所时，邻里之间通过共享粮食、互相安置、合力生产等方式，形成了临时性的互助团体。例如，在村落中，青壮年共同承担防护任务，老弱病残则由邻里共同照料；在城镇中，邻里之间互通物资、共建防空设施，以应对战争

带来的冲击。

（二）民间组织与行业团体的自发联合

在城市地区，商会、工会、慈善团体等民间组织通过自发联合，形成了广泛的社会支援网络。这些组织利用自身的资源优势，开展物资筹集、灾民救济、医疗救护等工作，为社会稳定提供了强有力的保障。例如，商会通过协调会员企业，联合筹集粮食、药品、衣物等物资，并分发给受灾民众或前线所需；工会则依托自身的组织网络，调动工人参与战时生产，确保日常物资和基础生活保障不间断。同时，慈善团体也积极投身于救济工作，通过募捐、义诊、设立安置点等方式，帮助流离失所的灾民和受伤人员，为社会的基本运转提供持续支持。

农村中的手工业者、商贩和农民依托地方性行业组织，在动荡时期通过互通有无、资源共享的方式，共同抵御战时冲击。例如，农民通过互助合作的方式，集中劳动力进行农田耕种，确保粮食生产不中断；手工业者则通过联合生产、互换物资的方式，弥补生产资料的短缺，保证生活必需品的供应。在一些区域，地方行业团体还通过建立互助资金或物资储备库，为困难家庭提供临时救济或生产工具支持，确保社会基本生计的维持。

三、抗战时期民间互助机制的运作模式

（一）资源共享与物资筹集机制

在社会动荡和物资匮乏的背景下，民间力量通过自发的资源共享和物资筹集，最大限度保障了民众的基本生计和社会稳定。在乡村地区，基于宗族和邻里的互助传统，村民通过共享粮食、耕具、劳动力等资源，共同维持生产和生活。例如，当部分家庭缺乏种子或农具时，其他村民便主动提供帮助，确保耕种活动不因物资短缺而中断；在遭遇兵灾或天灾时，宗族或村落内部通过轮流供养、互助安置等形式，保障弱势群体的基本生活。在物资短缺尤为严重的时期，村落还通过统一筹集、集中分配的方式，将有限的生活物资优先供给最需要的群体，确保村落的基本生计得到有效保障。^[10]

商会和工会等组织积极发动会员企业或工厂捐献生产物资或生活必需品，通过集体采购、集中运输、统一分配等形式，确保城市居民的基本生活需求得到满足。例如，商会通过与外地采购渠道建立联系，大规模筹集粮食、布匹、药品等生活物资，并统一分配给受灾家庭或流离失所的民众；工会则组织工人集体生产日常生活用品或防护装备，用于满足战时社会的基本需求。同时，慈善团体和地方志愿者还广泛发起募捐活动，通过社会捐款、义卖、集资等方式，筹集物资和善款，用于救济贫困民众、安置灾民和补充前线物资。

（二）互助合作与集体生产模式

抗战时期，民间力量在生存压力和物资短缺的背景下，逐步形成了以互助合作为核心的集体生产模式，以此缓解物资短缺、维持社会基本生产。在乡村地区，这种模式主要体现在农事生产和生活物资供给上。当部分家庭因劳动力流失或生产工具缺乏而无法开展农业生产时，村民便自发组成互助合作队，通过共享劳

动力、土地和农具的方式，共同完成耕种、收割和物资储备。例如，青壮年集体开展农田翻耕、插秧、收割等劳动，确保村内粮食产量不受战争影响；而妇女、老人则通过互助纺织、缝补衣物、制作干粮等方式，确保日常生活的基本供应。此外，村落之间还通过物物交换的方式，互通有无、调剂余缺，使得在极端环境下，社会的基本生产力和生活保障得以维系。这种集体生产模式强化了村落内部的团结互助精神，并有效缓解了战时物资短缺带来的生存困境。

在城市地区，工会、商会以及手工业者之间的互助合作也成为重要的生产模式之一。在物资短缺和生产条件受限的情况下，工人通过集中生产、协作互助的形式，最大限度维持工业生产和物资供应。工会依托自身的组织网络，动员工人集体生产生活必需品、防护设备及医药物资，并通过集中分配的形式，将生产成果优先供给受灾民众和战时前线。例如，纺织工会组织工人集中生产棉衣、布匹，优先供应给流离失所的灾民或前线人员；食品加工企业通过联合生产和调度，确保食品供给的基本稳定。同时，商会也积极组织手工业者互助合作，推动生产资料、原材料和成品的资源共享，减少原料短缺带来的生产中断风险。

四、民间力量团结互助机制的作用与影响

（一）提升社区内部的凝聚力与互助意识

抗战时期，民间力量的团结互助机制在社会动荡和资源紧缺的背景下，显著提升了社区内部的凝聚力和互助意识。在乡村地区，依托宗族、邻里和地方社会网络，民众通过共同生产、互助安置、联合防护等方式，形成了高度一致的利益共同体。例如，当部分家庭因战乱或灾害失去劳动力时，邻里之间会主动提供生产工具、农田劳作或生活物资，以确保受困家庭能够维持基本生计。这种互助合作的模式，使乡村居民在共同生存压力下强化了内部情感联系，增强了社区成员之间的信任感和责任意识。同时，宗族和地方精英通过组织民众开展集体劳动、修建防御设施或应急储备物资，进一步强化了社区内部的凝聚力，使民众在艰难环境下仍能保持社会秩序的相对稳定。

在城市地区，商会、工会、慈善团体等民间组织通过联合募捐、资源调配和救济安置，极大增强了社区居民的互助意识和团

结精神。面对物资短缺、流民增多等问题，商会成员通过组织义卖、募捐或救济物资分发，确保困难群体的基本生计需求；工会则通过集中生产、互助合作的方式，解决工业原材料和生产设备短缺问题，保障基本物资供应。这些举措使社区成员在共同的生存挑战下逐步形成了强烈的群体认同感和合作精神，民众之间互帮互助、共渡难关的意识明显增强。民间力量的团结互助不仅有效保障了民众的基本生活，也在潜移默化中重塑了社区内部的凝聚力，使社会在战时保持了较强的稳定性和韧性。

（二）增强民间力量的社会救助能力

抗战时期，民间力量的团结互助机制在社会救助方面发挥了重要作用，有效提升了社会弱势群体的生存保障能力。在战乱和灾害频发的背景下，大量流民、伤病人员和贫困家庭面临生计困境，民间力量迅速形成了以社会救济为核心的互助机制。在乡村地区，宗族和邻里通过集中粮食、临时收容、互助劳作等方式，为失去生活来源的家庭提供基本生存保障；村民还共同修建避难所、组织防护队，确保受灾民众在战乱中获得安全庇护。在城市地区，商会、工会和慈善团体依托自身资源优势，通过发起募捐、设置救济站、免费施粥等方式，为流离失所者、伤病人员以及贫困群体提供基本生活保障。此外，部分行业团体还通过联合生产和资源共享，为前线和受灾地区提供医疗物资和生活必需品。这种由民间力量构建的社会救助网络，不仅缓解了战时大量流民和受灾民众的生存困境，也增强了社会整体的抗风险能力和恢复能力，为社会秩序的维持提供了有力支撑。

五、结论

抗战时期，中国民间力量凭借强大的社会动员能力和互助合作精神，在资源筹集、生产互助、社会救济等方面发挥了重要作用。乡村地区依托宗族和邻里网络形成互助合作模式，城市地区则通过商会、工会和慈善团体建立资源共享与社会救济机制，共同维护社会基本秩序与民众生计。这种团结互助机制不仅有效缓解了战时社会资源短缺和生存困境，也增强了社区的凝聚力和社会救助能力，对社会稳定起到了积极作用。深入研究抗战时期民间力量的团结互助机制，有助于为当前社会治理、应急救援及社区建设提供历史经验和现实启示。

参考文献

- [1] 姜申. 中国电影国际传播流变中的民间力量[J]. 当代电影, 2024(1):50-56.
- [2] 张奇林. 慈善事业和志愿者服务：深受倚重的民间力量[J]. 中国社会保险. 1997,(7):12-13
- [3] 邵瑜莲. 民间，左翼与官方：抗战时期中国电影共同体的理论平台与对话协商[J]. 汉语言文学研究, 2023, 14(3):89-97.
- [4] 刘洪伟, 胡成. 民间救援队伍可持续发展的现状与对策[J]. 北京城市学院学报, 2023(1):11-15.
- [5] 刘娜. 国际传播中的民间力量及其培育[J]. 新闻界. 2011,(6):36-39.
- [6] 杨奇光, 常江. 搭建中国国际话语平台的民间力量及其实践路径[J]. 对外传播. 2017,0(5):7-9.
- [7] 王祥兵. 海外民间翻译力量与中国当代文学的国际传播——以民间网络翻译组织 Paper Republic 为例[J]. 中国翻译. 2015,(5).
- [8] 贾磊磊. 全球化时代中国文化传播策略的当代转型[J]. 东岳论丛. 2013,(9):DOI:10.3969/j.issn.1003-8353.2013.09.012.
- [9] 张奇林. 慈善事业和志愿者服务：深受倚重的民间力量[J]. 中国社会保险. 1997,(7):12-13.
- [10] 魏崇辉. 民间力量的累积和当代中国政治文明建设[J]. 内蒙古社会科学, 2007,28(4):11-14. DOI:10.3969/j.issn.1003-5281.2007.04.003.